

第 14 卷第 1 期 2021 年 04 月

Vol. 14, No. 1, April, 2021

国际高等教育

黑人的生命问题：国际观点和影响

珍视黑人生命 (Black Lives Matter)：国际视角和影响.....	1
海外学习在国际教育中推动反对种族主义所发挥的作用.....	3
珍视黑人留学生的生命.....	5
珍视黑人生命：学生与大学的角色.....	7

重要的国际问题

大学校长是否应该在公共事务中有发言权?.....	9
高等教育的学习成果与公众信任.....	11
美国大学国际分校在混乱世界中的挑战.....	13

全球研究趋势

世界研究：网络、增长与多样化.....	15
新冠疫情对全球科研的影响.....	18

国际化主题

迫在眉睫：医学教育国际化.....	21
中东与北非地区的新冠疫情和国际化.....	23
本土国际化：抓住机遇.....	25
留学的包容性：是否支持交换项目?.....	27

国家和地区

非洲大学的教学任务和教学方法.....	29
中国的精英高等教育.....	31
越南：人力资本作为公共利益.....	33
衡量印度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35

珍视黑人生命 (Black Lives Matter) : 国际视角和影响

杰拉德·布兰寇、菲利普·G·阿尔特、汉斯·德·威特

杰拉德·布兰寇 (Gerardo Blanco):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副主任

电子邮件: gerardo.blanco@bc.edu

菲利普·G·阿尔特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研究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汉斯·德·威特 (Hans de Wit): 美国波士顿国际高等教育中心教授、主任

电子邮箱: dewitj@bc.edu

新冠肺炎并不是目前影响高等教育的唯一破坏性力量。事实证明, 2020 年是对种族主义现实的觉醒之年, 尤其是在反黑人种族主义的最极端方面。在美国对新冠肺炎应对不力的全球头条新闻之余, 很快就出现了主要城市发生骚乱的新闻, 这是对乔治·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布伦娜·泰勒 (Breonna Taylor) 和许多其他美国黑人被警察杀害的回应。这场运动最初只是狭隘地回应美国警察的暴行, 但现在已经成为一场全球运动, 使人们注意到排斥、歧视和虐待的系统性表现以及反黑人情绪, 这些不仅仅发生在美国, 而且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

现有数据说明了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的范围。根据“门户开放”的数据, 在 34 万赴海外求学的美国学生中, 大约 17000 人 (5%) 选择了撒哈拉以南非洲或以黑人为主的加勒比国家。来自这些地区的留美学生约有 47000 人, 占美国近 110 万国际学生的 4%。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ors) 2017-2018 学年数据显示, 尽管黑人学生占美国大学招生人数的 13%, 但黑人学生在付海外留学的美国学生中的比例仍

只有 6%。因此, 黑人在美国国际化的各个方面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场危机应该被视为一个机会, 来检查国际高等教育潜在的共谋和疏忽, 并探索国际化专业人士如何也能成为种族正义的盟友。

全球反黑人现象

“珍视黑人生命”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世界各地的大学生通常是青年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都站在第一线。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 学生们已经开始反对大学的共谋, 因为这些大学向与奴隶制和殖民主义有关的杰出捐赠者和历史人物授予荣誉, 同时也反对各种种族主义政策。

美国校园中要求移除联邦纪念碑和名字的呼声引发了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运动, 比如要求从南非、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大学中删除塞西尔·罗兹 (Cecil Rhodes) 的名字。在拉丁美洲, 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遗产是相互交织的。在整个地区, 在西班牙殖民时期, 根据种族组成, 或是西班牙-欧洲裔、土著或非洲奴役比例, 出现了种族分类。当然, 这种等级制度在小规模的高等教育部门中得

以体现。毫不奇怪，黑人或大部分黑人群体处于社会金字塔的底部。虽然这一制度随着该地区的独立运动而被废除，但这种人们自认为的社会结构仍然具有影响力。该地区的“珍视黑人生命”运动，也让人们开始质疑著名殖民者的角色，如哥伦布（Columbus）和皮萨罗（Pizarro），他们的事迹通常会被公开纪念，特别是在学校，但如今也受到质疑。

以及特别是在学校会被公开纪念的他们的事迹，这些通常被公开纪念，特别是在教育环境中。

巴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珍视黑人生命”运动在巴西引起了强烈共鸣。这个国家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而葡萄牙恰巧也是最早在西非定居的欧洲强国之一，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起着关键作用。它是美洲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当代备受争议的公立大学招生配额制度表明，要解决种族主义遗留问题是多么复杂。

不幸的是，反黑人种族主义在今天很普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于一些错误信息指出黑人移民正在迅速传播疾病，成了一小部分企业和餐馆对黑人的禁令。也有关于中国大学校园歧视非洲黑人学生的报道。类似的反非洲歧视的例子也发生在印度。

种族主义并不局限于反黑人。只要回想一下疫情爆发之初，欧洲和美国以及高等教育领域反华裔和反亚裔的反应就知道了。在美国，拉丁裔移民和难民受到歧视，在欧洲，穆斯林移民和难民也受到歧视，主要是由于

限制他们接受高等教育和从事学术工作。这些只是最近高等教育中种族主义的一些例子。

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整个殖民地地区，大学在支持和支撑殖民主义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与种族主义有关。殖民政府建立的大学为殖民管理培养管理者，当然也设计了支持殖民主义思想的课程和风气。开普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所在的土地是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亲自捐赠的，这并不奇怪。然而，这些殖民大学教育了一代年轻人，他们最终推翻了殖民秩序。

一个地方性和全球性的问题

要想组织反黑人运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一个必要的步骤是认识到种族主义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高等教育中根深蒂固。许多人承认和批评它，但在现实中，高等教育系统已经习惯了它的存在，而没有对它采取行动。种族主义和国际化在高等教育研究和政策中被视为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国家问题，另一个是国际问题。我们必须挑战这一鸿沟：种族主义和国际化问题同时是地方性的又是全球性的，这已得到证明。

重要的是要解决反黑人和种族主义如何影响从招生到海外教育的各个方面，包括我们为黑人国际学生和学者提供的教育体验，我们的学术工作，以及我们的政策。

海外学习在国际教育中推动反对种族主义所发挥的作用

莫顿·伯鲁默尔、妮可·巴罗内

莫顿·伯鲁默尔 (Motun Bolumole):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硕士项目 2020 届毕业生

电子邮箱: bolumole@bc.edu

妮可·巴罗内 (Nicole Barone): 美国波士顿学院高等教育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 baronena@bc.edu

研究“海外学习”(study abroad)的研究人员和实践者应成为高等教育中有关制度性种族主义(institutional racism, 也称系统性种族主义[Systemic racism])对话的主要声音之一,特别是在学生发展领域。长期以来,“海外学习”一直将自己视为跨文化能力的源泉,由该领域的专家致力于此方面的工作与研究,承诺通过让学生接触世界及其人民,让他们更加宽容、理解和了解。从理论上讲,这些结果应该引导学生致力于反对种族主义、秉持正义和尊重所有人,无论其肤色、信仰或国籍。然而,美国有色人种学生海外留学的经历本身,以及关于是否需要反对种族主义的讨论,现在才出现。这表明,在种族问题上,该领域本身还有很多路要走。

海外学习中的种族与公平

从几十年来主导该领域的学术话语,到有色人种学生如何参与并获得何种学习体会,留学中的种族问题需要在更深层次上进行辩论。有色人种学生在海外学习中的代表性不足是一个永远存在的讨论话题。然而,尽管公众承诺要增加留学中的种族多样性,特别是在白人占主导地位的机构中,但参与这些努力的学者和从业者传统上都过分强调有色人种学生在获得留学机会方面所缺乏的东西,而不是追究制造和维持这些障碍的系统责任。因此,美国留学项目在多元化

方面的努力进展缓慢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美国,各院校主导的以及私营机构的留学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是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延伸。在这个系统中,不愿意承认和解决长期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种族问题,等于故意忽视了院校中的有色人种。事实上,有色人种学生出国留学的经历,恰恰挑战了这样一种说法,即:学生通过海外学习会变得更理解、更有同理心、不会倾向于接受种族成见。当黑人学生出国留学时,他们说他们在国外所经历的大量种族主义是由他们的白人同龄人所长期遗留下来的,而白人同龄人占美国所有留学人员的70%。若要学生们从海外学习归来后更愿意、更自在地与“差异性”打交道,我们应如何调和这一点呢?

多样性的语言表述

在其名为《种族主义制度生活的多样性(On Being Included: Racism and Diversity in Institutional Life)》的书中,莎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描述了“多样性”这个术语的多种定义,包括多样性的多种实施方式——从多样性在公平与包容声明及宣传资料中的使用,到多样性如何被用来表示组织机构的价值观和优先事项。这样的分析已经超过了院校层面在课程和学术项目中对多样性、公平性与包容性的声明。海外学习这个领域有时确实会故作姿态,而不是开展试制

工作以促进种族、经济和社会正义的实际工作。

除了“多样性”、“意识”和“理解”等在海外学习论述（和宣传）中的象征性语言之外，机构内部很少明确寻求与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其他社会问题作斗争。

换句话说，反对种族主义的目标是现有的制度和结构如何在机构中维护或反对种族主义。它是一种面向变化的哲学，首先要求持续的、不断的、批判性的反思，然后积极致力于促进正义和公平的选择。为了真正开展反对种族主义的实质工作，海外学习必须从审视围绕其政策和做法的论述话语开始。

解决种族不公平问题

机构多样性的语言表述，从设计上来说，注定无法兑现它的承诺。我们现在应该超越这种解除武装的言辞，转向一种明确的反对种族主义、追求社会正义的伦理了。在实践中，该领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解决一直维护不公平的现实：

- 继续多元化海外学习领域及其领导层；
- 拒绝指责有色人种学生在海外学习中代表性不足（例如，由于他们缺乏金融、社会或文化资本）的赤字叙述，评估机构政策（如 GPA 最低标准）是否存有排他性；
- 提供资源以帮助有色人种的学生出国留学。未被充分代表的有色人种学生需要更多的外展、具有文化适应性的建议和财政支持；
- 打破留学泡沫，即将赴海外学习的美国

学生与其美国同学一起参加美国式课堂和课外活动，这种方式没有挑战到学生的视角和观点，也没有真正提高他们对民族和文化差异的认识。

最重要的是，解决种族不公平问题，意味着在所有学生的海外留学项目中嵌入反对种族主义课程。课程应该帮助学生反思他们在世界上的特权和社会地位；让学生参与东道国的社会正义问题；让学生掌握与东道国环境、学术文化和人民打交道的工具；并让学生们思考他们可以如何利用自己的经验为他人服务，特别是作为校园内反对种族主义工作的领导者。

在海外学习中，对更明确的学习成果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任何改变学生的努力都必须是明确的、有意的和可协调的。我们上面列出的解决留学领域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排斥的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旨在开启对话。

结语

根据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According to the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ors）的数据显示，2018-2019 学年，约有 34.1 万名学生出国留学，其中 30% 是有色人种学生。

“海外学习”在为所有学科背景的学生提供反对种族主义教育方面具有独特地位。它可以为学生提供的一个脱离美国社会的“第三空间”，让他们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有空间去观察、体验和欣赏新的、不同的存在和行为方式。这是转变的真正机会。

珍视黑人留学生的生命

克里斯蒂·A·乔治·姆旺吉

克里斯蒂·A·乔治·姆旺吉 (Chrystal A. George Mwangi):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
校高等教育副教授

电子邮箱: chrystal@umass.edu

无论黑人走到哪里，他都是黑人。
(Wherever the Negro goes, he remains a Negro) —— 弗朗茨·奥马·法农 (Frantz Fanon, 1952)

当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与校园内的系统性种族主义作斗争时，要记住，反黑人种族主义也是一个涉及国际学生的问题。黑人留学生主要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加勒比地区，占美国所有国际学生的 4% 至 5%。尽管这个比例很小，但黑人留学生在高等教育机构的黑人学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特别是在重点院校和研究生项目中。然而，对于黑人留学生来说，第一次体验到美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系统性种族主义而感到困惑和不确定是很常见的。美国的种族现实，可能与许多黑人国家的社会化和种族显著性截然不同。当黑人留学生来到美国，他们所感受到的差异往往与他们的外国身份/国籍有关，而不是美国社会强加给他们的种族定位。这并不意味着黑人留学生不会受到种族主义的负面影响。黑人留学生的生命也很重要。

美国的学习 (反) 黑人和种族民族主义

黑人留学生在美国种族问题上的最初隔阂，以及他们应对种族主义的方式，可能表现为试图远离或忽视这些问题。然而，美国国内种族主义和反黑人的制度化性质及其在高等教育中的嵌入，造成了校园内的种族遭

遇和歧视，往往迫使学生考虑自己在美国的种族地位和身份。随着时间的推移，黑人留学生表示经历了比白人留学生更多的歧视，包括社会孤立和被排除在小组工作之外，被使用种族污言秽语、种族微词，以及其他来自大学城的教师、工作人员、学生和当地居民的骚扰。在世界教育服务机构 (World Education Services) 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四分之一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留学生认为，歧视是他们在教育经历中最重要的三大挑战之一，这一比例高于所有其他国际学生群体。

黑人留学生在种族主义和反黑人方面的经历，还与美国沉浸在仇外心理、反全球主义言论和民族主义的社会政治氛围交织在一起。例如，许多黑人留学生来自被特朗普总统成为“狗窝”的国家。美国校园里的仇恨言论、推崇民族主义和反移民情绪也在增加。美国白人教师和同行如何看待黑人留学生的口音、语言和文化差异，会带来负面的成见。美国社会将非洲描绘成贫穷和不稳定的地区，或将加勒比海地区的人描绘成吸食大麻的人，这些都加剧了美国社会用种族民族主义 (racist nativism) 的方式对黑人留学生的看法。

消除种族不公正

种族民族主义的经历在许多方面对黑人

留学生的福祉和学习表现产生了负面影响，包括乡愁加剧、学业成绩下降、自尊心减弱、压力加大、学业退缩、自我孤立和社交退缩等。在动荡的美国社会政治环境中，作为临时签证持有者，他们很容易因为说出自己所经历的种族民族主义而遭到报复。此外，由于与种族有关的学生服务往往集中在国内学生身上，与国际学生服务隔绝开来，黑人留学生得不到为其多重边缘化身份服务所需的直接支持和资源。

黑人留学生可能对他们在反对种族不公正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不确定，因为他们的传统并非源于美国的历史种族边缘化，即使他们受到这段历史的影响。然而，许多黑人留学生也致力于反种族主义工作，并通过在美国各地的社区活动、文化组织和抗议活动动员起来，与散居海外的反黑人现象作斗争。

美国高等教育机构能做些什么？

在过去的十年里，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加勒比地区的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美国仍然是许多非洲学生，特别是尼日利亚和南非学生的首选。然而，鉴于目前的环境，美国可能不再是黑人留学生的首选目的地。虽然美国高校出于经济原因追求国际学生的入学率，但黑人留学生在结构上的代表性不足，使他们更难在群体社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或动员起来获得更大的支持和宣传。美国高校需要有意识地录取黑人留学生，并增加他们的人数比例。然而，录取黑人留学生的工作应该与改善美国黑人的录取工作同时进行，而不是成为美国黑人学生代表性的替代。

同样重要的是，黑人留学生和他们的经

历得到承认和优先考虑，例如，通过收集可以按种族和出生年龄分类的机构数据，增加黑人留学生在他们的机构中的可见度。这可能需要收集学生人口数据，这就超出了联邦或州报告所需的数据（例如，通过问学生的种族和诞生地信息等，而不是完全由外国留学生状态/国籍分类，或认识到黑人留学生不太可能称自己为黑人/非裔美国人，因为黑人留学生不是美国人）。可分类的数据将使各机构能够追踪黑人留学生的需求和进步。这样做可以提供微妙的信息，以开发或加强资源。例如，为国际学生服务的国际办公室应该准备好与学生就种族民族主义问题进行交流，并与咨询服务、多元文化事务和学术事务等办公室合作，以便为这些学生服务。这将使大学不再只招收国际学生，而转向以学生保留（retention）为基础的模式。

然而，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必须超越为黑人留学生提供应对种族民族主义经历的策略和社区支持。要改善校园种族和全球气候，应该融入大学的国际化和多样性战略，以确保国际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学生有平等的机会取得持续的成功。还可以建立方便、安全的偏见报告程序，让黑人留学生有正式的结构，以确保他们的种族民族主义经历得到处理。高等教育的领导者必须认识到，种族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单一的结构，而是存在于对这些学生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交叉点上。因此，在为教职员工和学生制定反对种族主义培训和规划时，聚焦并整合种族民族主义和反黑人种族主义是很重要的。如果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相信应该珍视黑人留学生的生命，他们必须努力拆除边缘化、压迫和孤立这些学生的校园结构。

珍视黑人生命：学生与大学的角色

达纳·唐尼

达纳·唐尼 (Dana Downey):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纽约大学 (the New York University Abu Dhabi) 职业发展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downe174@umn.edu

2020 年 5 月, 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 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被杀, 全世界都陷入了痛苦之中。在美国之外, 这起惨案在阿姆斯特丹、奥克兰、柏林、巴黎、圣保罗和东京引发了和平抗议, 提高了公众对根深蒂固的压迫和不公正的意识。“珍视黑人生命” (#BlackLivesMatter) 运动的发起人、动员者和推动者都是学生。在校园里, 学生们正在向他们的学校请愿, 要求提高种族意识, 与系统性的不公正作斗争。他们呼吁增加教师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代表性, 在数字和平面媒体进行包容性交流, 并在制度上承诺解决“微侵犯” (microaggressions) 等问题。

学生的角色

从历史上看, 学生激进主义在动员群众进行社会变革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虽然学生可能不是这些运动的中心人物, 但他们已形成了他们的信息渠道和意识形态。尽管有太多的学生活动是文明和有序的例子, 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尽管学生行动主义的历史支离破碎, 但学生参与社会变革的历史主题一直存在。

鉴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精英学生越来越少, 学习方式更加灵活, 教学内容也越来越少, 一些人曾预测, 学生行动主义将会减少。事实上, 事实并非如此。最近的示威活

动在明尼阿波利斯产生了反响, 那里的学生要求他们的学校切断与当地警察局的联系, 并跨越大西洋来到牛津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在那里, 有关罗德奖学金 (Rhodes Scholarship) 的根源和历史的批评性对话重新被点燃。在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 一所以多元文化为主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文理学院, 学生们呼吁学校承认种族不平等是一个全球问题, 而不仅仅是美国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 反种族主义运动与校园有着密切的联系。巴西版的“珍视黑人生命”运动在校园倡导, 并在巴西积极组织抗议活动。“珍视黑人生命”倡议也在英国诺丁汉城市和大学社区之间成为一项学术合作活动, “珍视黑人生命”甚至被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授予 2017 年悉尼和平奖。

值得注意的是, 大多数学生活动都是地方性的, 与类似的警察暴行或反黑人问题有关。这是对殖民和新殖民影响的共鸣, 是学术文献中能广泛观察到的一股潜流。

大学的回应

随着校园的国际化 and 全球流动, 学生的人口结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元化。这使其本身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种族差异, 即使多样性的说法被认为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发展前景。最近发生的事件使许多人的生活经历得到了印证, 学生们要求全球高等教育做

出回应。

当学生寻求对抗制度化的不公平和大学的共谋行为时，各院校意识到，沉默是一种强有力的声明，可能会危及他们的国际化目标。代表性不足的群体和国际学生渠道是脆弱的，在这个疫情时代更是如此。

大学的反应既有公众的，也有个人的。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向学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重申其对多样性的承诺，并鼓励积极报道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牛津大学罗德信托基金（Rhodes Trust）发表了一份声明，回顾了之前的偏见和进步，并宣布了下一步具体行动的新承诺。西澳大利亚大学发表了一份声明，呼吁结束黑人在拘留期间的死亡（包括土著居民），在这些地方，警察暴行被广泛记录。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the New York University Abu Dhabi）向新生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种族不平等是高等教育的一个强有力的现实，他们作为学生应积极面对这一现实。这些对行动和公开信息的承诺标志着意图，而不仅仅是可衡量的变化，但这里强调了问责制。

促进改变

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学者们一直记录着

校园里的不公平现象，以及因全球化和大众化而放大的贫富差距。与此同时，大学也被认为是公益的载体，产生了社会和公共利益，如提高公民生活质量、社会凝聚力和对多样性的欣赏。凭借他们的研究能力，他们作为知识“经纪人”和创造者的角色，以及他们对学生的巨大影响，他们在推动这类运动方面处于独特的地位。

随着全球种族意识的萌芽，高等教育机构在建立地方相关性和探索内部不平等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迄今为止的行动主义证明了一个深切而持久的担忧，但研究可以提供基础设施，并为政策变化提供信息，而政策变化往往是从这些方面开始的。因此，大学也被迫进行长期而严格的内部审视，批判性地评估自己是如何成为同谋贡献者的，以及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为什么这一切现在正在变得具体化？也许是因为事件被拍了下来，或者是因为警察的不人道的无知，或者是因为他们与国家的关系？也许是疫情时代让人过度警惕？不管怎样，包容是这个时代的需要，是这个十年的关键问题，与教育的未来紧密相关。全球高等教育不能错过这一窗口。

大学校长是否应该在公共事务中有发言权？

罗伯特·A·斯科特

罗伯特·A·斯科特 (Robert A. Scott): 美国纽约阿德尔菲大学 (Adelphi University) 名誉校长

电子邮箱: ras@adelphi.edu

在一个充斥着知名人士、名人和民选官员发表谎言和歪曲事实的时期，谁来为真相说话？谁来支持科学知识以及道德、法律和科学在指导政策制定方面的作用？

朋友们问：“当科学顾问被蔑视，健康安全规则被推翻，当政府问责制度被取消，道德上的愤怒在哪里？”他们指出，大学校长缺席有关公共政策的辩论，尤其是当政策的改变使公众面临空气、食物和水污染的危险，或对学生和教员的权利造成威胁时。这些人还经常提到已故的圣母大学 (Notre Dame University) 前校长西奥多·赫斯堡神父 (Father Theodore Hesburgh)，他在担任民权委员会主席时勇于发声。

有些人还记得校园校长们抗议越南战争和南非种族隔离，或者在美国倡导平权行动。他们问：“现在这样的声音在哪里？”支持公立学校、枪支安全措施、替代化石燃料的声音在哪里？关于教育和医疗机会不平等、关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数百万无家可归儿童的演讲和报纸专栏在哪里？

这个时代是否不同？当代校园校长在道德权威上是否与过去的校长不同？大学是一个道德机构，其目的是为社会福利添砖加瓦。它是由国家特许的，它的使命之一是教导和培养学生的道德观。道德是关于对与错的，而伦理学往往关注的是一种“正确”或正确的行为与另一种行为的比较。

大学的角色不仅仅是创造新知识和管理社会历史。它的使命还包括“评论家”。机构领导人可以问“为什么”和“为什么不？”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测试来发展知识和培养智慧。

大学校长担任首席任务官 (Chief Mission Officer)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学校长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更多人似乎认真对待首席执行官 (CEO) 这个头衔，而这个头衔在赫斯伯格那个时代并不被重视。这类用词很重要。首席执行官的职责是什么？我们会想到经营的规模和范围、货币和市场、员工、价格和利润。但赫斯伯格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担任“首席任务官” (Chief Mission Officers, 简称 CMO)，即使他们不使用这个头衔。作为一个为公众利益的道德组织，赫斯伯格和其他人专注于机构的使命和宗旨。

我更喜欢首席任务官这个称号。它指定了一个不忽视金钱和市场的校园领导者，但他尊重机构的宗旨和传统。对于首席任务官来说，历史给了我们教训。这包括提醒教职员工、学生和受托人过去做出的道德选择。这些选择包括扩大招生和教育机会，引入西方典籍之外的课程选择，避免投资于香烟、啤酒和酒类，以及回避想要利用校园作为平台的政治演讲者。

首席任务官是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倡导者。当他们就道德或伦理问题发言时，他们会小心翼翼地鼓励交流意见，甚至是那些与他们自己相反的意见。他们还明白，“自由”意味着作为公民具有责任感的自由，而不是摆脱社会义务、同情心、共同的道德观和政府的自由。

大学使命宣言和高谈阔论中经常引用的一句话是：“真理将使你自由”。虽然这句话出自《圣经新约》(Bible's New Testament)，但“真理”的概念在大多数宗教传统中都很常见。但什么是真理呢？《圣经》中的这句话需要信仰，需要顺服于一个神秘的事物。这不是学院或大学的真理。这个真理是基于事实，而不是观点；基于证据，而不是顿悟。

校长的角色

对首席任务官来说，为自己说话和为机构说话是有区别的。各机构不应表达政策立场，除非这些政策立场是由该机构的理事会按照适当的顺序采取的。因此，校园领导不应该代表学校就投资政策等问题发言，除非是校董会的政策。校长的立场可以在校董会的范围内表明，他或她可以在校董会上主张改变机构政策。

然而，这并不是说校长或副校长在会议室外就可以保持沉默。他或她可以为学术自由、社会正义、世界和平以及教职员和学生言论自由辩护。他或她可以强调提供教育机会的必要性，并区分意见和事实。他或她可以呼吁基于事实的真相，而不是基于感情、迷信或政治姿态。

一些校长对政策问题的发言犹豫不决，因为他们觉得“说了会被骂，不说也会被骂”，正如一位校长在讨论这个话题时告诉我的那样。他们害怕惹恼持其他观点的受托人、捐助者、校友和民选官员。他们担心会受到报复，可能会威胁到政府的援助，甚至是机构的税收状况。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倡导道德观点比简单地批评一项政策更好。校长需要创造理解的桥梁，而不是加深分歧。校长可以通过表明不同意（但不认人厌）来促进文明。

美国当前的政治气候使这些校长更加谨慎。保守的政治家、记者和评论家批评高等教育过于“自由主义”。他们说他们不相信大学。他们指责大学声称促进言论自由，但并不支持保守派演讲者。

道德观的护道者

作为首席任务官，大学领导有义务就关爱和道德观点来提醒校园和更广泛的社区。争议中的“可教育时刻”不是演讲的机会，而是询问政策和行动的公正性。仅仅是为公立学校提供不充分的支持？还是仅仅是将监狱和养老院外包给那些将利润置于医疗保健之上的公司？难道只是把战争手段取代外交手段作为政府的第一行为？这些就是“为什么”和“为什么不”的伦理问题。

特别是在今天，我们需要那些一流大学的声音来指出谎言和不公正。大学校长必须重夺首席使命官的职责，提醒其所在社区历史的重要性，鼓励辩论和尊重他人，并成为运用伦理观点的典范。

高等教育的学习成果与公众信任

蒂亚·洛克拉、海伦·彼特鲍尔

蒂亚·洛克拉 (Tia Loukkola): 欧洲大学协会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机构发展主任

电子邮箱: tia.loukkola@eua.eu

海伦·彼特鲍尔 (Helene Peterbauer): 欧洲大学协会政策和项目官员

电子邮箱: helene.peterbauer@eua.eu

学习成果是关于学习者在学习经历或学习次序结束时应该知道和能够做什么的陈述。在高等教育机构内, 它们的目的是指导课程的开发和教师讲授课程的工作。它们应该与教学法和评估方法保持一致, 从而确保教育经验的核心方面面向相同的结果和学生的学习。在欧洲大学协会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欧洲大学协会进行的 2018 年趋势调查中, 近一半的受访者报告说, 学习成果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教学方法论的变革。所报告的其他好处包括修订课程内容和评估, 以及增强学生对学习目标的认识。

除了作为促进以结果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的一种学习工具, 学习成果还有另一个基本目标, 即确保和促进教育提供者之间的公众信任。它们是提高高等教育及其利益相关者 (尤其是社会) 透明度和问责制的一种工具, 社会需要确保高等教育在资助过程中所贡献的附加值。增强的透明度被认为能够促进跨国界的理解和可比性——这是推动欧洲博洛尼亚进程 (the Bologna Process) 的基本理想。

定义预期的学习结果

考虑到这一双重功能, 在过去 20 年发展

的许多框架中, 为了提高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信任, 学习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 它们是世界各地资格框架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发展的核心。在欧洲高等教育领域, 所有 48 个国家都有或正在制定国家资格框架。随着高等教育领域区域合作的增加, 区域 (参考) 资格框架应运而生。举几个例子, 欧洲和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盟) 都有区域框架, 非洲目前正在建立一个区域框架。这些框架的目的是通过使用学习成果作为描述符, 在既定的框架水平内分配资历, 以提高资历的透明度和可比性。

其基本理念是, 所有的学习项目都应正确地与各自的国家资格框架相一致, 以确保公众毕业生拥有框架内相应水平的知识和技能。框架允许教育部门以外的行动者和利益相关者“阅读”并理解毕业生的知识和技能, 从而评估这些知识和技能如何适合劳动力市场, 这只是一个例子。这些框架还允许对来自不同制度的资格进行比较, 从而支持教育和就业目的的行动自由。

验证已取得的学习成果

但是, 是否有一种通用的、可转移的方法来验证学生们已经达到了他们课程规定的学习成果, 并且证明这种方法正在起作用? 经

合组织 (OECD) 发布“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估可行性研究”(Assess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Outcomes, 简称 AHELO) 已有 10 年, 该研究旨在开发一个国际评估框架和工具, 以衡量大学本科毕业生知道什么和能做什么。这项迫切需要的研究的出发点之一是, 人们意识到有必要就高等教育学习的有效性提供国际上可比较的数据。这种需要主要是由于要求在高等教育中加强问责制和透明度, 并强调学生成绩水平的可比性。最终, 这个项目的经验表明了有关此类评估工具全球视角的方法论问题。结果, 该项目被放弃了, 此后没有任何类似的努力。

“欧洲高等教育学习成果成效的测量与比较”(Measuring and Comparing Achievements of Learning Outcom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 建成 CALOHEE), 奔着同一个目标(也就是, 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来找到比较不同国家学生成果的方法), 采取不同的角度, 强调评估中不同机构和项目情况。该项目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由国际调谐学院(International Tuning Academy)协调; 因此, 该方法的结果和成功性尚不清楚。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 衡量高等教育学习成果和提供可比性的标准化测试难以获得, 也是非常罕见的。然而, 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利用学习成果来验证教育的有效性, 同时又尊重个别系统和机构的情况。在欧洲, 《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标准与准则》(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规定, 高等教育机构必须确保其课程有明确的学习成果(标准

1.2) 作为学生评估的基础(标准 1.3)。因此, 该框架将学习成果及其适当的评估固定在内部质量保证中。它将充分衔接和实施学习成果的责任分配给了高等教育机构本身。而每个机构在这方面的做法可能有所不同。

可比性高于问责制?

虽然学习结果基于一种共同的方法, 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或它们的评估必须在标准化的意义上具有可比性, 更不用说在不同的高等教育系统中是相同的。在国际层面上比较学习成果的大规模尝试的不足并不意味着学习成果作为一个概念在其透明度功能方面是有缺陷的, 因为透明度并不否定多样性。学习成果为高等教育机构和他们的利益相关者带来了许多益处(欧洲大学协会的 2018 年趋势调查表明), 而且他们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因此, 学习成果构成了欧洲各种透明度和问责制工具的关键因素。

目前对学习成果进行定义和评估的分散方式对其他比较工具(如大学排名)提出了挑战。欧洲大学协会最近对国际大学排名中使用的教育质量指标进行了测绘, 结果显示, 测绘中涉及的所有排名都缺乏与学习成果或学习质量相关的指标。这一发现与该研究的总体结论(这一地图是其中的一部分)一致, 即在最近的过去, 高等教育在使用质量或有效性指标方面没有实质性的发展。这表明, 没有一个有意义的、一刀切的工具来定义和评估高等教育的结果。然而, 如前所述, 学习成果可以通过多种其他方式促进公众对高等教育机构的信任。

美国大学国际分校在混乱世界中的挑战

丹尼尔·肯特

丹尼尔·肯特 (Daniel C. Kent): 高等教育研究员

电子邮箱: danckent@gmail.com

自 2010 年《国际高等教育》首次发布有关国际分校 (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es) 系列文章以来, 这一独特的高等教育事业一直在复杂的环境中不断演变和发展。然而, 在快速变化的全球背景下, 国际分校就如整个高等教育一样,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美国大学致力于国际分校的发展, 这些国际分校深受欢迎, 这凸显出他们多方面的作用: 提供一个新的收入来源, 为国内学生提供了出国留学的另一途径 (从而使得留学收益免于流失给国际竞争对手), 以及提升其在国内外教育市场上的威望, “吹捧” 他们的国际影响。根据美国跨境教育研究团队 (Cross-Border Education Research Team, 简称 C-BERT) 2017 年国际分校列表的数据, 美国的国际分校占全球所有开设分校总数的近三分之一, 这与美国目前在国际高等教育声望和资源方面的国际领先地位相符。其他拥有大量分校的国家是英国和法国, 其次是俄罗斯。

但根据 C-BERT 的数据, 在美国院校建立的近 100 所分校中, 有 25 所分校倒闭或关门。据报道, 这一切都发生在 2000 年至 2015 年之间。这一比率远远高于其他发展国际分校的国家。在 42 所英国的国际分校中, 只有 4 所倒闭, 由法国院校建立的 28 所国际分校中, 只有 1 所关闭。

挑战和强制关闭

对于那些有意发展收入多元化和对国际化感兴趣的大学来说, 设立国际分校似乎非常有吸引力, 尤其是对美国的大学来说。但是, 美国高等教育的领导者往往错误地估计了设立这些学校的挑战和潜在的回报, 最终导致学校被迫关闭。由于全球新冠疫情危机, 其中许多挑战只会不断扩大, 危及那些正在发展期的国际分校或那些没有坚实财政支持的院校。

美国的国际分校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一个很难改变的长期挑战: 建立分校, 无论对主办学校来说多么有利可图, 都是一件棘手的事情。缺乏建立分校经验的大学可能会措手不及, 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资金、基础设施和精力。这些错误的计算已经困扰着像卡塔尔社区学院 (the Community College of Qatar) 这样的机构, 它最初是作为休斯顿社区学院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的一个分支校园而建立的。据报道, 卡塔尔社区学院从一开始就管理不善, 其开办和运营都被美国管理者搞砸了。学院领导人未能为学校申请获得认证, 领导层的更替导致了头几年的动荡, 卡塔尔和休斯顿社区学院官员之间的沟通不畅导致了教育管理基本问题的混乱。此后, 该学院完全由地方控制, 目前仍在运作, 但不是作为国际分校。休斯顿社区学院的唯一参与仍然是作为一个咨询实体。

在外国政府的环境中寻觅方向, 也可能

是美国管理者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一个障碍。首先，获得当地政府的认证对许多国际商学院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与美国的认证标准有很大差异。即使获得了美国机构的认证，纽约理工学院（New Yor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在巴林的校区也收到了当地认证机构的差评。在完全禁止招收新生的一年前，该校区的商科专业就已经被禁止招收新生，因此被迫停办。但即使假设成功通过认证和监管，许多国际分校合同也会面临政府迅速改变主意的情况。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在迪拜的牙科项目校园在第二批学生毕业后就结束了，虽然没有像其他许多国际分校的关闭一样受到媒体的报道和争议，但也是如此。当地政府决定该机构完全由当地控制，将其重新命名为“迪拜牙科医学院（Dubai School of Dental Medicine）”，与波士顿大学没有任何关系。

提供高质量的美国高等教育项目，并提供与之相匹配的师资声望和学生体验，也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作，各院校只能靠招生规模和当地政府必要的财政支持来支撑。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筹款，而大多数美国院校又习惯于通过研究资助、基金会资助和校友捐赠等形式来筹集资金，这就更加剧了对这两种收入来源的依赖。因此，在 25 所失败的美国国际分校中，许多分校都是由于缺乏资金而关闭的，要么是过度预测学生需求，要么是失去了所需的政府援助，这些失败例子也就不足为奇了。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Ras Al Kaimah 的校区面临着压力，要以高入学要求录取学生，以复制其在弗吉尼亚州主校区提供的质量。但该校始终无法吸引大量既合格又对其课程感兴趣的学生——即使在其最高峰时，其学位课程仅招收了 120 名学生。该

校区于 2009 年关闭，没有任何学生毕业，学生入学率和学费收入低于预期。内华达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evada）拉斯维加斯酒店管理学院（Las Vegas' college）在新加坡创办分校五年后，由于成本增加，当地的赞助机构估算要使学院继续生存则财政支持须增加一倍，这导致该学院的关闭。而雅典拉维恩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a Verne Athens）在 5 年内失去 40% 的学生后关闭，成为希腊最昂贵的高等教育选择。

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将进一步破坏国际高等教育和国际分校的生存环境。世界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转向民族主义、孤立的姿态和政策，敌视外国意识形态，并可能敌视其教学法。在许多国家正在经历的这股民族主义浪潮中，新的美国分校可能不可能建立起来，而现有的分校也可能面临一个陌生的敌对环境。

此外，还有不可预测的全球挑战带来的威胁，如新冠疫情，进一步削弱了已经萎靡不振的全球化运动。由于许多分校通过与外国政府丰厚的交易向主办学校提供资金，分校受到的威胁也是对其主办学校的威胁。

展望未来

美国大学的国际分校未来的表现如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几所分校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们拥有蓬勃发展的学生群体、积极从事研究的师资力量和坚实的财政基础，直接使其主办大学及其所在国家和地区受益。但是，并不是所有在海外有实体机构的院校都会或已经如此幸运。随着世界进入一个更加混乱和不确定的时代，将对整个民间社会产生重大的连锁反应。高等教育，特别是那些在国外建立校园的机构，将不得不适应这些挑战，否则将面临关闭的风险。

世界研究：网络、增长与多样化

西蒙·马金森

西蒙·马金森 (Simon Marginson): 英国牛津大学高等教育教授、英国 ESRC/OFSRE 全球高等教育中心主任、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首席研究员、《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期刊主编

电子邮箱: simon.marginson@education.ox.ac.uk

1990 年互联网开始后, 全世界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有史以来第一次加入到一个单一的合作研究网络中, 以网络的方式, 全球科学系统开始以超乎寻常的速度不断扩展。全球科学发展同时出现了五个趋势, 它们相互促进, 正在改变着人类社会创造和分享知识的过程。第一, 研究投入和科学论文产出快速增长。第二, 拥有自身科研体系且研究活跃的国家数量不断增加。第三, 由来自一个以上国家的作者的合作论文比例增长。第四, 与国家科学系统相比, 网络化的全球科研系统的比重不断增加。第五, 研究领先国家呈多元化。

经合组织数据显示, 1995 年至 2018 年期间, 几乎每个国家都增加了研究支出。按实际价值计算, 这一数字在美国增加了一倍多, 在德国和英国几乎增加了一倍, 韩国的研发支出是原来的 5.6 倍, 中国的研发支出是原来的 16.5 倍。这种不断增长的财政能力与博士毕业生、受雇研究人员和发表科学论文人数的比例增长有关。从 2000 年到 2015 年, 美国的博士毕业生数量每年增长 2.9%, 印度增长 4.7%, 中国增长 10.9%。在 2000 年至 2018 年间, 斯高帕斯数据库 (Scopus) 上发表的论文总数从 2000 年的 107.2 万篇增至 2018 年的 255.6 万篇, 年均增长 4.95%; 以历史标准衡量, 该增速非常迅猛。

中低收入科学国家

网络化的全球科学系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共同的知识宝库。各国需要它们自己的科学能力, 包括博士教育, 以便能够有效地访问这个知识库。国家间的合作更加多元化, 更多的国家参与其中, 并加快了这些国家的发展。

全世界都在发展其科学能力。在 2018 年发表超过 5000 篇论文的 15 个国家中, 2000~2018 年间的发文量增速超过了全球平均增速 4.95%。在这 15 个发文量快速增加的科学国家中, 有 9 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低于 2018 年的世界平均水平 17912 美元。这些国家是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科学能力正在世界范围内扩展。1987 年, 全球 20 个相对富裕国家的发文量占有所有已发表科研成果的 90%。到 2017 年, 32 个国家的发文量之和占有所有已发表科研成果的 90%, 这表明了科学发展中更高的全球多元化。

新的科学强国包括世界第四大人口国家印度尼西亚, 该国研究人员 2018 年在斯高帕斯数据库上发表了 26948 篇论文。从 2000 年到 2018 年, 印尼的年产出增长了令人难以置信的 26.4%。印度现在是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生产国, 在 2018 年发表了 135788 篇论文, 并在 2000 年至 2018 年期间以每年 10.7% 的速度增长。2018 年发表论文

超过 5000 篇的其他快速增长的国家科学系统包括巴西、哥伦比亚、埃及、摩洛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突尼斯。尽管美国在高被引论文数量上保持着长期的领先地位，但从 2000 年到 2018 年，中国科学论文发表量以每年 13.6% 的速度增长，2016 年首次超过美国。

科学总量的增长也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数量增长有关，这些一流大学拥有大批科学产出。莱顿大学排名显示，在 2006~2009 年和 2014~2017 年的四年时间里，科学论文超过 5000 篇的大学数量从 131 所上升到 215 所。

合作

也许全球研究变化的最显著迹象是国际合作论文的数量越来越多。1970 年，国际合著论文仅占科学网 (Web of Science) 索引论文的 1.9%。到 2018 年，斯高帕斯数据库中 22.5% 的论文由多国作者合作。在欧洲，这一比例非常高，因为欧洲的研究资助制度更青睐多国团队：例如，意大利的国际合作论文为 50.2%，英国为 61.7%，瑞士为 71.8%。在美国，这一比例为 39.2%，远高于平均水平，但在中国、印度和伊朗这类新兴国家，这一比例较低。在这些国家，潜在国内合作伙伴的数量一直在迅速增长。

在设备成本均摊的学科中 (如望远镜、同步仪)，或者主题具有全球性 (如气候变化、水资源管理、流行病)，国际合作尤为重要。2016 年，天文学领域 54% 的论文是国际合著，而社会科学领域只有 15%。

瓦格纳 (Caroline Wagner)、雷德斯多夫 (Loet Leydesdorff) 及其同事对全球网络的研究表明，合作主要不是由国家科学政策推动的，而是由研究人员本身自下而上的合作

推动的。这类合作自由扩展，以便吸收新的国家和研究团体。现有的强国不充当守门人。新兴科学系统中的研究人员往往直接相互联系。越来越多的科学议程是在全球层面而不是在国家层面确定的。

研究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在全球层面，美国仍然是最强大的参与者。英语是唯一的全球语言，以其他语言进行科学工作，特别是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工作，在世界范围内被边缘化。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科学能力和成就分化严重。然而，科学的发展和多样化，与研究力量的部分多元化 (partial pluralization) 有关。

其中变化巨大的是东亚的崛起，特别是中国、韩国和新加坡加入日本的行列。东亚在物理科学和工程方面非常强大，在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方面仍然一般。中国现在在数学和计算机研究方面排名第一。清华大学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起，成为世界上两所顶尖的 STEM 大学。印度、伊朗和巴西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好消息

在困难时期，全球研究合作是一个好消息。这不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竞争科学地位的研究人员也可以自由地跨国界合作，并相互尊重。在这个阶段，全球研究没有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漩涡，而新冠疫情增强了全球合作和生物医学中开放科学的内在价值。

跨境科研合作不像跨境学生流动那么容易受到影响，各国在疫情期间一直保持着这种合作。虽然研究受益于会议、实地访问和人员交流，以及大型实验室和研究所受到社交距离协议的限制，但大多数形式的研究合作可以在网上维持一段时间。

各国对全球化和共同体制的抵制严重影响贸易和技术合作，是科学领域的一种威胁。中美两国在研究领域的关系，包括联合任命和国际博士生，很可能会受到新冷战地缘政治的干扰。然而，这两个世界科学大国的研究人员，将继续在其他地方建立网络——美中合作可能会证明比特朗普政府将想要的更有影响力。只要维持支助研究的资源流动，

全球层面的所有研究和合作将继续增加发展。

注：这篇文章摘自“Changing Higher Education for a Changing World”一书的第三章（Callender, Locke and Marginson, 2020, 由 Bloomsbury 出版社出版）。一些数据已做更新。

新冠疫情对全球科研的影响

徐昕

牛津大学教育系全球高等教育中心 ESRC 博士后研究员

电子邮箱: xin.xu@education.ox.ac.uk

新冠疫情正在重塑世界，包括学术界。我们所熟悉的“正常”正在消失，并将需要重写。本文回顾了新冠疫情对全球科研的影响，并对后疫情时代的学术界提出了新的定义。

研究网络：合作与竞争

全世界正在见证关于新冠疫情的研究快速大批增长。国际组织、政府、科学期刊和资助机构一直在呼吁研究人员联合起来应对这场危机。早期文献计量学证据表明，跨国界、跨学科、跨部门和多边合作继续存在。

另一方面，竞争和竞争依然存在。对新冠肺炎疫苗的全球研发竞争是受竞争影响的一个生动例子，也是科学研究和对知识的内在追求如何与个人利益、制度利益、商业价值、公共利益和（地缘）政治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一个例子。特别是，疫情加剧了现有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例如进一步限制了学术流动和中美这两个全球科研的重要生产国之间的伙伴关系。目前还不清楚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研究是否会转向更全球性、区域性、全国性或地方性的议程。

科研生态：人文主义与开放性

新冠疫情正在重塑全球科研的生态，重建人类（如研究人员、参与者、利益相关者）以及与非人类受试者（如知识、资源、出版物）之间的关系。

科研界正在展现韧性、团结和人文主义。疫情隔离期并不是休假期。相反，对于学者来说，这是一个需要在限制和不确定中工作的具有挑战性的时期。尽管如此，科研活动仍在世界范围内继续。学者们迅速适应了网络教学、在线会议和在线研究的完全转变。许多人向他们的同事、参与者和学生表示同情和相互支持，从而共同面对脆弱时刻并团结起来。此外，管理主义文化似乎暂时让位于人文主义方法，对研究人员优先对待，而不是将其视为“研究成果的生产者”，强调幸福而不是绩效和生产力。科研评估，比如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时钟，都在被推迟。资助机构调整了他们针对项目、研究人员和学生的计划，允许项目延长和作出相应改变。

即使各个国家现正处于封锁隔离时期，但科学变得更加开放。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越来越多的资助机构、出版商、期刊、机构和研究人员正在接受开放科学。出版物、课程、档案和数据库都可以在网上自由、公开、快速和广泛地共享。这些公开数据，包括基因组序列，使全世界能够及早开始开发新冠肺炎的诊断方法和疫苗。对于与新冠肺炎有关的研究，预印本数量大幅增加，同行审查程序加快，并通过临时特别计划批准出版物开放获取，从而取消收费墙。

科研生涯：停滞与不平等

由于旅行的限制，学术界已经转向了物

理上的静止和中断，但虚拟上的流动和沟通。这是对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概念和方法的重新定义。重点已经从人员和设备的跨境移动转移到数据、信息和知识的跨境流动。许多会议被取消或推迟，另外也有许多会议转移到网上平台。转移到虚拟空间增加了此类活动的包容性、可访问性、成本效率和环境友好性，但也引发了对数字平等、安全和隐私的担忧。

此次疫情对学术界的影响特别大——学者们在经受着同样的风暴，但在不同的庇护所。例如，期刊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封锁隔离期间，女性研究人员的投稿率较低。来自黑人、亚裔和少数族裔群体的学者面临着威胁、攻击，或者因新冠疫情引起的种族主义带来的额外情绪劳动。由于经费削减和收入损失，空余学术职位较少，特别是对那些非终身教职的学者不利。

新的证据表明，学术界内部的不平等加剧，这些不平等基于性别、种族、信仰、族裔、社会阶层、健康状况、照顾责任、纪律、机构、职业阶段、行政或教学角色、出生国家或地点、居住国家或地点等因素。这种不平等不仅表现在某些群体的研究效率下降，还表现在对他们的短期/长期财务状况、工作保障、职业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疫情没有创造我们正在见证的不平等，但它加剧了这些不平等：在这冰山一角之下是全球研究既存和制度化的不公，以及管理主义、施事行为 (performativity)、歧视、排他、市场化以及研究政治化的痕迹。仅仅解决不平等的症状是不够的，需要重组的是这个体系。

科研道德与影响：诚信与责任

科学界面临着新的或更严重的伦理挑

战。由于流动性和社会联系的限制，研究者不得不适应数字化和创新的方法，这导致了对这些方法的伦理担忧。快速通道和与新冠病毒相关的研究经费、项目、活动和出版物的竞争，引发了对研究共同体、参与者、资助者和社会对此类研究的严密性、诚信、质量、影响、风险和价值的质疑。此外，对“紧迫性”的强调使与新冠肺炎没有直接关系的学科（特别是人文和社会科学）边缘化，而具有直接影响潜力的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得到了更多的认可和充足的资金。

在疫情期间，研究是希望的灯塔。人们认为科学证据对政府的反应和公众行为有影响。然而，研究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在多大程度上被负责任地使用和传播，在多大程度上被信任？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因政府、媒体渠道和社区而异。对研究的误读和误用也时有发生，比如使用未经同行评议的预印本作为诱饵或作为政策主张的“可靠”证据。

重新定义未来的全球研究

我们正站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十字路口。我们把历史包袱和知识带到了当前的危机中。与此同时，我们当前的经历将被载入史册，被后人回顾。

在这一点上，对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进行反思是至关重要的。改变可能是暂时的，但决定是否采取行动将改变我们的未来。例如，当前开放的人文文化是否会成为“新冠疫情限量版”，还是会成为一套新的规范？当前的缺乏流动性可能是暂时的，但重新定位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却是长期的。

“新规范”对全球科研意味着什么？当前发声变化的事物会永远改变吗？更具体地说，目睹全球科研如何共同造福人类，如何

才能超越零和游戏，将研究理解为一种全球共同利益？有了这些潜在的积极变化的证据，我们如何维持这些变化，并建立一个开放、平等、伦理、强健、可持续、人文、多元化、协作、负责和值得信赖的全球科研社区？

对于这些问题可能没有直接或明确的答案。然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个长期的愿景，需要结构上的改变，以及需要来自世界各地所有学者、利益相关者、机构和国家的集体承诺。

迫在眉睫：医学教育国际化

安妮塔·吴、杰佛瑞·诺尔、贝蒂·利斯克、丽莎·恩斯特、爱德华·催、汉斯·德威特

安妮塔·吴 (Anette Wu):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Columbia University) 病理与细胞生物系的助理教授、“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为医疗保健行业培养全球领导者”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Exchange Program – Preparing Global Leaders for Healthcare) 创始人/主任
电子邮箱: aw2342@caa.columbia.edu

杰佛瑞·诺尔 (Geoffroy P.J.C. Noel): 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 (McGill University) 解剖系解剖科学部副教授、主任
电子邮箱: geoffroy.noel@mcgill.ca

贝蒂·利斯克 (Betty Leask): 澳大利亚墨尔本拉特罗布大学 (La Trobe University) 荣誉教授
电子邮箱: leaskb@bc.edu

丽莎·恩斯特 (Lisa Unangst):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博士研究生、比利时根特大学博士后研究员
电子邮箱: unangstl@bc.edu

爱德华·催 (Edward Choi):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 eddie.chae@gmail.com

汉斯·德·威特 (Hans de Wit): 美国波士顿国际高等教育中心教授、主任
电子邮箱: dewitj@bc.edu

新冠疫情的发生表明需要在生物医学研究、教育和病人护理方面进行有效的国际合作。这种全球卫生紧急情况需要：有效的国际沟通、专业且具有文化能力的医疗管理与实践（地方、国家与国际层面）、迅速的国际公共卫生行动措施，以及国际生物技术和医学科学的合作研究。今天，这些要求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应该纳入全球医学教育课程的基本组成部分。

医学教育国际化的定义

目前，对医学教育国际化这个广义术语，有不同理解方式。我们的研究表明，例如在美国，它通常主要通过全球健康项目来进行，这些项目主要代表全球南北倡议，或者通过

解决当地与健康有关的社会问题。然而，医学教育国际化应兼顾国际化的各个方面，包括跨文化和国际问题如何影响本地和全球的专业实践和医学教育。医学教育国际化需要同时涉及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

鉴于当前的医疗环境，医学教育国际化可以帮助建立国际卫生挑战的意识，创建一个发展国际合作和交流的基金会，以及为学生提供一个医疗实践的全球视角，这样下一代的医学专家在解决全球健康问题是能够有效工作并协作。

医学教育国际化和全球健康——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

在当今世界，“医学教育国际化”、“全球

健康”、“全球健康教育”等名词不再可以互换使用。虽然医学教育国际化与全球健康有重叠，但这两个领域是截然不同的。医学教育国际化是医学教育实现国际教育目标的一种教育理念、框架和手段，而不是医学教育本身的目标。通过医学教育国际化所培养的医学能力能够最终改善全球健康。尽管通常被理解为医疗系统中的一个社会公正领域，但全球健康的经典定义包括改善全世界所有人的健康。全球健康的终极教育目标和医学教育国际化重叠（如文化能力），而医学教育国际化则强调对国家之间差异（如：国际卫生系统、经济学、法律、伦理、结果措施）的比较与分析并强调国际间的相互理解。在此背景下，医学教育的国际化突出了各个国家之间学习意义上的差异，而全球健康问题则影响着各个国家。

目标与成果

医学教育国际化对于确保未来的医生在全球参考框架内实践医学至关重要。此外，它可以为国际管理与合作提供基础和框架，并为医生提供文化能力培养，最终改善全球医疗保健，从而增强全球健康。

与医学教育国际化相关的目标和结果包括但不限于：提高对社会、跨文化和伦理差异的敏感性；了解并珍视医疗保健服务系统之间的差异；了解全球公共卫生所面临的挑战；深入了解全球生物医学研究；以及发展国际网络、领导力和协作能力。从而，医生和医疗领袖能够作为具有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的医疗从业者来行医。

国际教育工作者需要看到，重视培养所有医科学生对与医学研究和实践相关的社会、文化和伦理问题的理解能力，这是相当重要的。然而，尽管这些对全球健康有潜在的积极影响，但如何实现上述目标和结果并不是全球范围内共同的优先研究问题。

呼吁医学教育国际化

迄今为止，医学院校的国际化教育是零散的，能力没有达成一致，国际化项目也各不相同，没有官方的指导原则，也没有达成统一的形式。所发表的研究主要是在其他健康专业（如护理和公共卫生）的期刊内，很少在医学期刊上发表。为了使人们认识到医学的全球性，医学教育的国际化需要在医学院的标准课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必须将其确立为教育研究的一个研究领域。

国际化元素应该是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医学院的选修部分。也不应将国际化因素与其他主题内容相竞争。对于许多院校而言，（课程外）学生出国流动是医学教育国际化的代名词。然而，这些项目只对一小部分学生开放。我们认为，这种方法是不够的，需要一种关注所有学生和医学教育者的国际方法。

医学教育国际化可以在国内外的许多学术层面上实现，包括政府和机构层面、大学内部、教师和学生之间。没有“一刀切”的方法。健康专业工作者、医学教育工作者、全球卫生教育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学家需要通过跨学科和国际方法，共同制定出最适合每个学校和国家的最佳模式与方法。鉴于目前的环境，我们认为这是教育研究和专业实践的优先领域。

迫切需要将医学院课程设置与传授建立在以研究为主导的课程设置、教学、学习与国际化之上。这也就需要具有国际意识和跨文化能力的医学教育者。正如我们在 2020 年了解到的那样，成功的全球医疗未来在于下一代医学领导者的协作和国际能力。如果不能将医学教育国际化纳入医学教育，就会限制医学生对于与医疗有关的全球社会、文化和伦理问题的理解——这就阻碍了医学高等教育能够为塑造全球医疗和改善全球健康做出的贡献。

中东与北非地区的新冠疫情和国际化

吉利亚·马切斯尼

吉利亚·马切斯尼 (Giulia Marchesini): 世界银行地中海一体化中心 (World Bank's Center for Mediterranean Integration) 高级伙伴关系官员

电子邮箱: gmarchesini@worldbank.org

中东与北非地区有着悠久而丰富的学术传统, 近几十年来, 入学人数和机构数量都有了巨大的增长。然而, 该地区在国际化方面滞后。根据国际大学协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最近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调查, 中东和北非是最不吸引全球机构发展伙伴关系的地区。

区域背景

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年轻人, 特别是弱势群体, 面临着接受高等教育和极高失业率的严重问题。对许多人来说, 教育未能履行其承诺, 即使他们做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准备, 并在其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新冠疫情危机可能会加剧这些挑战。到目前为止可以看到的影响包括: 一些学校已经关闭, 课程被取消, 国际学生仍然滞留。新冠疫情对教育和国际流动性的长期影响以及预期的经济衰退可能会加剧其影响。这是在民族主义和反移民怨恨日益加剧的全球背景下发生的, 这可能会加大政府的压力, 要求它们继续加强边境安全, 并将目光投向国内。然而, 同样的危机正表明, 流动性对当今世界是多么重要。

中东与北非地区亟需两大当务之急: 通过培养该地区青年适应全球化世界的技能而重新思考教育, 从而 (1) 向世界开放, 以及 (2) 重点投资人力资本。国际化有助于实现这两个目标。目前, 新冠疫情可能是中东和北非地区各国在其国内发展本土国际化的一个

好时机, 因为该地区在发展本土国际化方面有其优势。

中东和北非地区国际化的现状

尽管中东和北非地区在高等教育以及学生、学者和知识的流动性方面有着丰富的历史, 但今天该地区在国际化方面仍然落后。在发展国际伙伴关系时, 世界上很少有机构将中东和北非地区视为优先考虑对象。

该地区的确拥有非常多的国际分校 (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es, ibc), 尽管它们大多集中在海湾国家地区, 如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国际分校的全球主办/接收国中排名前五。在这六个国际公认的教育中心中, 这两个国家同样包含其中。此外, 有重要证据表明本土国际化开展的各项活动, 包括课程国际化和国际合作在线学习 (collaborative online international learning) 等。进一步的国际化努力包括跨地中海伙伴关系模式, 在过去十年中, 该模式已使得埃及、约旦、摩洛哥和突尼斯等国家建立了几所国际大学。

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学生 (向内和向外) 流动性相对较高。该地区国际学生入境流动率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 本国学生出境流动率也明显高于平均水平。然而, 经过更仔细的分析, 一幅更微妙的图景浮现出来。国际学生入境流动只涉及少数几个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 在阿联酋和卡塔尔, 国际学生分别占所有学生的一半和三分之一以上, 而

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国际学生数与世界平均水平持平或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尽管如此，在过去的十年里，进入该地区的国际学生人数一直在稳步增长，而且在几乎所有中东和北非国家，国际学生入学人数的增长速度高于本国学生的入学人数——其中一些国家的增速高于其他国家。大多数国家可以归类为“新兴”目的地（海湾国家和摩洛哥）和“成熟”目的地（埃及、约旦和黎巴嫩），前者的外国学生人数增长迅速，后者的国内和国外入学人数都有适度增长。

从整个地区的分布来看，本国学生出国流动率也好坏参半。一些海湾国家和一些马什里克（Mashreq，即指阿拉伯东部地区）国家的出国留学人数很高，而一些北非国家的出国留学人数也很高，摩洛哥和突尼斯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和三倍左右。分析流动学生的来源和出国目的地，有助于解释该地区吸引力有限的原因：该地区的入境学生中，略多于一半来自该地区本身，而大部分（而且越来越多）的出境学生前往该地区以外的地方学习。

新冠疫情与前进道路

为了制定有关的政策建议，我们必须认识到某些因素。首先，只有更广泛的改革来解决包括自治在内的机构治理问题，国际化努力才会产生重大影响，因为没有这一点，国际化就不太可能站稳立场。第二，环境也很重要：一些海湾国家确实在国际分校集中度和学生流动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考虑

到该地区政治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巨大差异，适合这些国家的策略在其他国家可能并不适用。第三，有必要对国际化、国际化的实施及其带来的好处进行更多的研究。最后，这是一个充满冲突和大量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脆弱区域。难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一个关键问题，因此，该地区加强国际化的行动也需要关注包括难民学生和教师。

国际化需要成为更高的优先事项，纳入各院校和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的主流。在后新冠疫情时代，考虑到流动限制、经济挑战和更广泛的影响，高等教育机构将需要进行彻底变革和适应。在疫情爆发之前，一种更加强调本土国际化的方法已成为一个关键的起点，这主要是因为本土国际化被证明对于提高技能和增加就业力方面有益处，且成本相对较低，易于实施。如今，这些益处必须与危机中产生的变化相结合。加强本土国际化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院校如果有意接受和适应新冠疫情后的“新常态”，采用新的创新学习模式，他们就会受益。一个例子是利用在线学习的趋势，并推动虚拟流动、国际协同教学等元素。在当前的背景下，抓住机会在整个地区发展本土国际化活动，可以使中东和北非地区真正推进国际化，并进一步受益。

注：本文基于《中东北非高等教育国际化》（report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ertiary Education）报告而成（World Bank/CMI, 2020）。

本土国际化：抓住机遇

玛德琳·F·格林

玛德琳·F·格林 (Madeleine F. Greene): 国际大学协会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高级研究员、国际学生交换计划 (International Student Exchange) 委员会主席

在学者和从业人员思考国际化的未来时，一个主要问题是，疫情是否会为本土国际化注入新活力，特别是人员流动性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收到限制。这种现状的破坏是否会促使各机构将注意力集中在本土国际化的学术与社会文化效益上，并重新发现被经济方面所掩盖的国际化的基本价值和原则？增加全球学习的机会、降低碳足迹和减少人才外流的好处是否会给本土国际化带来新的动力？高等教育是否可以考虑对本土国际化和流动采取综合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方法？迄今为止，许多机构在本土国际化方面的进展不大。如下文所述，要使本土国际化摆脱困境，必须具备一些条件。

抓住现在的机遇

通常情况下，需要一种紧迫感来推动重要的改变。这种压力通常是外部力量或一系列环境因素的结果，如预算危机、政府政策的变化，当今则是新冠疫情。尽管本土国际化在大多数学校进展缓慢，但现在有机会将大学的注意力转向本土国际化。如果学生在不久的将来不打算出国学习，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让他们发展全球知识和技能？像本土国际化这样由内部产生的变革，通常始于这样一种感觉：某件事没有发挥作用（一个问题），或者至少可以发挥得更好（一个机会）。本土国际化既代表了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全球知识和跨文化技

能的需要），也代表了一个机会（接触更多的学生、教师和工作人员）。变革的第一步是抓住时机，共同认识和定义这个问题，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环境所带来的机会。这就要求领导者让本土国际化得到关注、开启对话，并促进教师之间的大量讨论，通常这些是在院系和项目层面进行。这些对话应该使大家在问题性质、共同目标和行动战略上达成一致。

重构讨论：目的而非手段

当前国际化话语的一个主题是，国际化本身并不是目的。相反，它是一种促进院校和社会目标的手段——提高教学和研究的质量，培养受过教育的公民，解决地方和世界问题。根据国际化的目标而不是过程来重新组织讨论，应该使人们能够把本土国际化作为促进全球学习的关键方法。这将减少本土国际化和流动性之间的二分法，允许“两者”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做法。任何这种思想上的转变都绝非易事，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国际官员的微妙领导，以及教职员对本土国际化更明显的支持。

多层次的领导力

持久的学术变革需要强有力的教师领导，以及来自学校领导明确的言语和实际支持。要更加重视本土国际化，就要对学生需要学习什么，以及每位教授的课堂上发生了

什么进行新的思考。行政准则可能会促进某种程度的服从，但它们很少能够推动思维或信念的转变，即新方法只是一时的时尚而已。出于同样的原因，只有少数教师支持的变革很少能推广。教职员需要得到支持、资源和政策改变的鼓励。简而言之，本土国际化快速发展将需要一群能言善辩的教师领导，他们会得到院校的大力支持。

集体行动和个人行动

学术孤岛以及课程缺乏集体主人翁精神（有时甚至在学术部门内部）导致在许多院校中课程总体还不如其各组成部分。教授们有自己的课程，但是各院系不一定提供一个连贯的学习项目，以至于学生对于课程的理解主要建立在先前的知识或者将关键概念从一个课程连接到另一个课程。

正如零散的课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集体主人翁精神，院校无法系统地将本土国际化纳入课程和校园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缺乏集体行动。将特定课程国际化固然是个好主意，但这并不能确保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获得全球知识或跨文化技能。同样，少量的国际研究项目会提高这些特定项目的质量，但很可能对其他项目没有影响。

本土国际化所需的课程和课外变化需要

集体审视当前的课程和校园生活，发展共同的目标和方向，达成一个共同的行动章程，提供广泛的共性，同时允许每个教师和管理者以自主方式实现这些目标。

一个积极的议程

大多数机构都渴望培养出具有全球素养和能力的毕业生——这个目标在今天尤其应该引起共鸣。在一个受新冠疫情影响、不平等加剧以及遭到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不断困扰的世界里，院校需要成为并被视作进步和希望的灯塔。疫情为各院校及其教员和行政人员提供了一个机会，向学生和公众表达它们的价值观和它们对社会的贡献。本土国际化作为一项重要战略，有可能获得广泛支持。

虽然新冠疫情可能为本土国际化提供了一个机会之窗，但如果没有抓住时机、新的语言和目标意识、以及在许多机构层面的承诺和领导，进展仍将缓慢，且本土国际化仍将被视为一个较低的优先事项。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变革，要求许多教员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自己的学科和课程，要求行政人员为院校的运作以及本土国际化与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制定不同的参考框架。挑战是巨大的，但机会唾手可得。

留学的包容性：是否支持交换项目？

玛丽·马克提

玛丽·马克提 (Mary MacKenty): 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 (the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Madrid)
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 mary.mackenty@estudiante.uam.es

大学的海外游学 (study abroad) 网站上到处都是年轻学生在重要国际地标前的照片。他们很少被描绘成与当地学生一起在当地大学“出国留学”。大多数美国学生使用由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和第三方机构运营的“混合” (hybrid) 项目，这些项目统管他们的学术 (很多是内部的)、旅行、住宿和课外活动。而交换项目 (exchange program) 是最少被利用的，尽管是最便宜的。考虑到成本是海外游学的主要障碍之一，那么为什么大学不更好地利用他们的交换项目呢？

交换协议允许美国学生直接在合作院校注册，同时支付他们在本国大学的学费，并维持他们的经济援助。学生自行安排机票和住宿，因此不需要支付额外的项目费用。事实上，交换项目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很普遍，其中欧洲的伊拉斯谟项目 (Erasmus program) 最为知名。接收院校提供广泛的学术课程，在人数不足的专业和辅修课程中提高包容性。交换项目也为可能已经具备所需语言技能的第二代学生打开了大门。同时，它们往往是与来自不同地区的主办院校一起发展的，从而使选择更具多样性。

那么，为什么美国学生要为有组织的出国游学项目支付更多的费用呢？也许这是保证学分转移最简单的选择？也许交换生项目在后勤和学术上都太有挑战性了？或许，美国的民族中心主义世界观让人觉得，国外高等

教育质量较低，不值得美国支付学费？或者，也许是这种概念已深入人心，从而使得学生们认为留学项目是留学的唯一途径？虽然这种被社会接受的出国游学概念可能对学生和大学都很方便，但一个不幸的后果是，它创造了限制我们与当地环境互动的美国“气泡”。出国的目的难道不是让自己沉浸在另一种文化中，并在它带来的挑战中成长？而不是躲避文化差异吗？由于当前新冠疫情对留学影响的不确定性，入学人数下降可能会导致项目难以为继。也许应该进一步研究交换计划，因为它们所提供的机会和所带来的挑战，都是在未来不确定的情况下增加包容的可行选择。

更深层次的文化感受

通常，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实践者对海外游学缺乏语言和跨文化学习表示担忧，这至少部分是由于缺乏文化沉浸引起的。这些项目通过寄宿、实习、志愿服务、语言交流和支持跨文化和/或全球学习的课程，鼓励学生与当地文化的互动。尽管如此，让学生在本地建立友谊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选择花时间和本国的同龄人用英语交流。这些游学项目的结构通过把学生安置在一个舒适的美国中心来为他们提供庇护，而交换项目则挑战他们通过与当地人和机构的互动来学习如何驾驭外国环境。

参加交换项目的学生必须自己组织学术协议、旅行计划、住房和社交生活。由于缺少现场工作人员作为项目学生的对话者，他们不得不与接收院校的人员进行沟通，以安排他们的住宿。学校也会提供入学指导，所以他们的第一个接触对象是当地和国际学生，而不是美国学生。学生与当地学生一起上课，获得了另一个社会互动和发现新视角的机会。在新环境中学习的经验帮助他们发展横向技能，如适应能力、灵活性和跨文化团队合作能力，这是 21 世纪工作场所的宝贵能力。他们可能不住寄宿家庭；然而，一般的住宿安排是与当地学生合住宿舍或公寓。学生从在另一个国家解决问题的经验中来学习，这可以促使他们增加自信和独立能力。文化的沉浸本来就比较深，因此提供了更多的跨文化、语言和学术学习的机会。

太多挑战？

然而，游学项目受欢迎是有原因的。他们保证后勤工作顺利进行，为文化冲击提供情感支持，也为出现任何问题提供实际支持。此外，对于那些注册了一些本地课程的学生，课程计划保留了一份预先批准的名单，上面列出了过去的学生成功学习过的课程。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大多数课程都要收费，那么学生必须要求这些支持；但是，我们明智的做法是重新审查哪些是真正必要的，以及这些安排是否可以由本国院校与接收院校来提供。

在后勤方面，如果我们认为学生们足够独立，可以组织自己的休闲旅行，那么在今天的科技时代，千禧一代当然可以在网上预

订他们的旅行和安排他们的学生宿舍。接收院校也会为学生提供他们所在城市的后勤信息。另一方面，学术指导和确保学分互认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在本国大学，指导教师管理着许多协议，这使得他们很难深入了解每个接收大学的学术体系、学位项目和具体课程的复杂性。除了提供课程列表和课程表外，接收院校不一定提供学术指导。这可能会导致学生为了获得学分批准而选择与他们的学术背景不相符的课程。最后，通过伙伴计划 (buddy program) 的普及和提供当地历史和文化课程，接收院校对交换生的社会和文化融合的支持得到了改善；但是，没有现场人员能够提供 24 小时的协助。

为交换项目提供支持

交换项目有潜力提高出国留学的包容性。然而，需要更多的支持来克服课程和文化方面的挑战。更多关于接收院校学术项目的信息是必要的，以确保学生注册的学术相关课程将使他们获得成功。院校必须了解自己的学术文化，以便将这些文化恰当地传达给合作伙伴。为促进出国留学中跨文化学习而设计的课程，可以修改为交换项目，在本学期在线授课。在学术设置中添加与文化差异相关的模块也是恰当的，为学生创造一个空间来反思他们的直接入学经历。对于交换生所面临的具体挑战，还应进行更多的研究，以提高他们的体验。最后，如果我们要成功地将交流项目作为一种可行、成本效益高、沉浸式文化的海外留学选择，我们就需要改变对美国游学项目的看法，不再是服务提供者模式。

非洲大学的教学任务和教学方法

哈里斯·安多

哈里斯·安多 (Harris Andoh): 南非范德比耶尔帕克瓦尔技术大学 (the Vaal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研究与高等学位处、加纳阿克拉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所高等教育政策评估专家

电子邮箱: andoharris@gmail.com

在 20 世纪 40 年代成立时, 所有非洲大学的任务是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 大多数非洲大学更注重教学, 而不是其他核心活动, 如社会服务和研究。尽管它们从未被认为是传统意义上的“教学机构”, 但很明显,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 这种描述都很适合它们。

很少有非洲大学的新任务和战略计划与政策中将教学作为一项核心任务。例如, 莫桑比克的爱德华多-蒙德拉内大学 (the Eduardo Mondlane University) 宣称自己是一所“从根本上以教学为导向的机构”, 加纳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Ghana) 寻求成为一所“高质量的教学”机构, 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Ibadan) 将“优秀的教学和学习”作为其新的使命。另一方面, 纳米比亚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amibia) 和博茨瓦纳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Botswana) 的目标是在质量教育之外关注跨国研究, 而埃及顶尖大学之一的阿斯旺大学 (the Aswan University), 甚至没有在其新的使命声明中提到教学。

非洲大学的新政策和战略计划显然缺乏把教学作为一项核心使命和把发展教师的教学方法与技能作为一项明确目标的认真强调。然而, 为了确保各级教学的有效性, 教学技能对于向学生传授知识至关重要。非洲

大学越早认识到教学是他们的首要任务, 他们就能越快成功地改善他们的教学结构。

关键挑战

为了加强非洲大学的良好教学, 就需要确定与教学政策有关的关键挑战和当前教学努力的弱点。非洲各大学并未试图加强各研究领域相关理论与概念的教学。大学教师在课堂内外的教学讨论集中在一般的社会概念上, 而不是教学理论和概念上。非洲大学的教学和教学问题存在若干关键挑战, 包括任命没有教学背景或正式教学资格的学术人员; 作为教学发展的一部分, 缺乏对员工的强制性培训; 缺乏相关教学政策来指导大学如何提高教职员工的的教学发展技能。

非洲大学教学人员的技能培训集中在研究方法上, 而不是教学和学习。只有在南非, 由于其历史性的历史, 政府才将教学发展补助金 (Teaching Development Grant) 分配给大学。但是, 在提供赠款的情况下, 为教师提供的教学培训类型与质量不足以使受益者具备大学教师教学的适当技能。

教学政策将指导大学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对非洲大学政策的在线搜索显示, 只有南非斯泰伦博斯大学 (the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在 2018 年采用了一项教学政策, 旨在促进实现其“愿景和制度战略框架”

(Vision and Institutional Strategic Framework)。其他著名的大学，如加纳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Ghana)、伊巴丹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Ibadan) 和开普敦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要么缺乏教学政策，要么还未在网上宣布这类政策。相比之下，欧洲的大学特别强调拥有教学资格的学术人员的重要性。

在斯高帕斯 (Scopus) 数据库对“教学法”和“非洲”进行搜索，结果显示：除了南非在该领域发表了 635 篇文章外，加纳、肯尼亚和其他一些非洲国家在过去 30 年平均发表了 5 篇相关论文。进一步研究表明，这些出版物中有 62% 主要是关于教育研究的。

伊巴丹大学不向其教员提供任何关于教学技能的正式培训，而是为新雇用的教员提供关于教学和学习的讲习班。在加纳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Ghana)，有一个针对新教师的初始培训项目，其中包含了教学的重要组成元素。加纳夸梅·恩克鲁玛科技大学只在教师提出要求时才向他们提供教学技能。在开普敦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新学者实践者计划” (New Academics Practitioners) 只向教员提供基本的教学技能培训。该大学的“学术人员发展计划” (Academic Staff Development)，包括教学改进倡议，旨在为教师发展反思性实践和营造持续学习的文化。自 2015 年以来，南非茨瓦尼理工大学与芬兰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 (the Haaga Helia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合作，为教师提供职业教学的研究生文凭，因此被认为是该领域的领导者。

这些非洲著名大学的例子表明，改善教学方法的努力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为了克服机构层面和教师个人层面的挑战，在教学使命中实施更深层次的结构变革，并强调教学政策和注重质量的教学培训，都应明确优先考虑。良好的教学应该是坚实且被认可的教育方法的结果，包括行为主义、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

前进道路

非洲大学应该设计和实施结构化计划，以增进良好的教学和学习做法。加纳大学已经为此做出了努力，学校相关的讨论使学校本身推动建立了一个教学中心的决定，但这一决定缺乏紧迫感。

一个更系统化的教学政策应该解决关键的理论问题以促进教学，比如课程的非殖民化、包容性、如何正确地使教学与学科的具体内容相一致的问题，以及如何加强有关理论概念与教学方法的教学等问题。教学政策还应包括相关管理问题，如教学作为员工晋升标准的重要性，并注重质量和教学成果，而不是教学年数。

非洲大学应认识到，没有适当教学技能的教学对学习结果会造成不利影响，适当和系统的教学培训应列入非洲大学的未来战略计划和改革议程。这是追求真正学术成功的关键标准。最后，向大学参议院或管理机构提交的年度教学报告可以作为检测与评价非洲大学促进教学方法发展的一种手段，报告应该包括教师为取得公认的教学资格而进行的活动信息。

中国的精英高等教育

郭聪斌

北京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教授、教育数据研究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cbguoguo@pku.edu.cn

许多学生把希望寄托在常春藤盟校的教育上,但由于这些大学竞争激烈,只有少数人有可能实现他们的梦想。在中国,常春藤盟校的概念相当于入选“211工程”、“985工程”和最新升级的“双一流计划”的大学。

“211工程”与“985工程”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制定了“科教兴国”的国家战略。1995年,中国实施了“211工程”,目标是到世纪之交发展100多所高等院校和关键学科。建设“211工程”所需财政支持来自国家、部门、地方和高等学校本身。该工程优先发展对国家具有重要价值的学科,并为入选的大学提供基础设施。

继“211工程”的积极成果之后,中央政府又向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即“985工程”。该项目于1998年5月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启动时得名。从1999年到2013年,985工程分三期实施,第一期为1999~2002年(2003年是过渡阶段);第二期为2004~2008年(2009年进入过渡阶段);第三期为2010-2013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所大学如何入选该工程,并没有任何公开具体说明或指导方针。第一期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入选首批重点投入院校;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入选为第二批重点投入院校。第二期,中国农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被列入“985工程”

重点建设院校行列。一般来说,大学和学院越早加入“985工程”,他们得到的财政支持就越多。“211工程”和“985工程”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果。在20年内,它促进了中国大学整体院校和特定学科快速发展。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科学出版物第二大国,包括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和会议论文集引文索引科学(CPCI-S)等。此外,在1995~2005年这段时间,教师和学生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偏远和欠发达地区的大学成功地吸引了更多的人才。

C9联盟

“985工程”入选高校中的9位校长于2003年举办了首届“一流大学建设研讨会”,成立了“九校联盟”(又称“C9联盟”)。这九所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它代表着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领先部分。教育部和财政部通过投入大量资金支持这些大学改革办学体制、加强科研平台建设并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将这九所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这九所大学在“985工程”每一期所获得的财政支持约为该工程财政投入的一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第一阶段获得了相当于约2.5亿美元的“985工程”专项资金,在第二期获得了大致相同的财政投入,在第三期增加到约3.75亿美元。

此外, 这些大学于 2009 年签订了《一流大学人才培养合作 与交流协议书》, 以期共享学术资源、培养优秀学生。在此协议下, 双方可交换本科生和研究生; 举办 C9 暑期学校以提升品牌效应, 吸引优秀学生; 并建立协作网络资源库, 共享学术资源及审核论文。

结果是显著的。从全球排名来看, 2012~2019 年间进入“QS 世界大学排名”前 200 名, 以及 2018~2019 年进入“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前 200 名的中国大陆大学均来自“九校联盟”的大学。在 QS 排名中,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尤为突出, 分别从 2012 年的第 46 名和第 47 名上升到 2015 年的第 41 名和第 25 名, 2019 年继续上升到第 30 名和第 17 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发展趋势相同, 分别从 2012 年的第 49 位和第 71 位上升到 2015 年的第 42 位和第 47 位; 2019 年, 这两所大学分别排名第 31 位和第 22 位。

“双一流计划”

自“985 工程”经历了 2014~2016 年三年过渡期后, 中国于 2017 年启动了“双一流计划”, 该计划旨在到 2050 年建成一大批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入选该计划的学科单位 137 个, 其中一流大学 42 个, 一流学科 95 个。“双一流”大学在地理上比“985 工程”大学分布更均匀。除原入选“985 工程”的高校外, 中原地区郑州大学、西南地区云南大学、西北地区新疆大学入选“双一流”高校。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985 工程”在中西部高校方面的不足。“双一流”的遴选过程更加透明, 建立了遴选委员会, 并有第三方参与。此外, “双一流”计划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竞争机制, 它考虑了大学近几年的表现情况。“双一流”大学被分为 A 类和 B 类

作为一种改进措施的鼓励方式。

“双一流计划”现在已经成为政府、企业和大学寻找人才的重要参考。与“985 工程”和“211 工程”相比, “双一流计划”改变了资源投入模式和管理体制。资源投入模式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化转变。构建政府、大学、社会组织、公众、第三方共同构建的管理体系, 让市场逐步推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换句话说, 政府希望将自己的角色从决策者转变为协调者, 并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环境, 以提高大学的市场竞争力。此外, “双一流计划”实行动态管理滚动预算制度, 定期监测和评估资金在内部和外部的使用效率。最后, “双一流计划”的财政投入不再像以前那样平均分配, 而是优先分配给高标准、特色鲜明的高校和学科, 发展优势学科, 加强新兴产业和国家战略需要的学科。

在前进道路上, 财政投入重要吗?

1995 年“211 工程”启动时, 中国财政收入约 752 亿美元。到 2017 年“双一流计划”开始实施时, 这一数额飙升至约 2.69 万亿美元。尽管顶尖大学的总预算是一个复杂的数字, 但用于教育的资金比例已经大幅增加。这是值得注意的, 因为就在 70 年前, 五分之四的人口还处于贫困和文盲的状态。

在财政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的同时, 中国高等教育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大学经费的管理系统需要简化, 例如: 通过简化申请程序和评估程序, 赋予研究人员更多的决策权和更宽松的研究环境从而选择并调整研究方法, 赋予他们对于研究结果的所有权或全部使用权等。尽管中国的大学不再面临极度的预算短缺, 但增加科研人员在资金使用方面的自主权将激发他们的主动性和创新意识。

越南：人力资本作为公共利益

阮志宏

越南融促大学 (FPT University) 英语系主任

电子邮箱: chinh6@fe.edu.vn

越南正面临技能人才短缺的问题。尽管 2014 年有 9070 万人口，但只有 6.9% 的人拥有大学学位，0.2% 的人拥有研究生学位。2011 年，越南政府发布了第 579/QĐ-TTg 号决定，批准了 2011~2020 年发展人力资本的多项战略。这一决定认为，人力资本是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竞争优势的最重要资产。

促进发展技能人才的雄心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越南政府将教育支出从 2000 年的 3.57% 提高到 2013 年的 5.7%，教育仍是国家预算的最大项目。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提高 10 所国内高等教育机构的质量，使其达到国际水平，另外重点发展 4 所大学，旨在 2020 年达到世界一流水平。高等教育的大门敞开了，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从 1993 年的 103 所增加到 2007 年的 322 所以及 2014 年的 419 所。高校在校生人数从 1987 年的 13.3 万人增加到 2015 年的 212 万人。这是通过与国外大学的学术关系、呼吁私营部门投资、提供英语教学的学术项目以及与世界一流大学合作来实现的。政府还鼓励教师和学生通过申请国内外奖学金或私人资助的方式出国留学。

预计到 2020 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大学教师人数将增加到 35%。“911 项目”（“322 项目”的延续）计划为 1 万名教师到世界一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提供全额奖学金，为 3000

名教师学习“三明治”博士课程（“三明治课程”通常包括有一段在国内的研究期）提供资助，并为 1 万名教师在 2010~2020 年在国内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提供资助。“165 项目”于 2008 年启动，为教育领域的领导者（或计划成为领导者的个人）提供留学奖学金。通过留学项目，这些教师旨在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和领导能力，并探索国际合作机会。如果该项目候选人被国外大学的研究生课程录取，他们将获得全额奖学金。

2005 年 10 月，教育和培训部签署了第 6143/QĐ-BGD&ĐT 号决定，资助了 1015 名来自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学生出国留学（81.3% 的学生攻读硕士学位，其余的学生攻读博士学位）。从 2005 年开始到 2015 年 4 月，该项目派出 502 名学生在 23 个国家的 160 所高等教育机构（其中 51% 的学生在欧洲，24% 在亚洲，19% 在澳大利亚，6% 在北美）攻读硕士学位，另有 50 名学生攻读博士学位。

越南政府的另一项战略是将技能人才送往其他国家。鼓励技术工人到国外工作一段时间，以帮助国家加深与国际友人的多边关系，增加国家收入。2011 年，在海外工作的越南技能和半技能人才的汇款达到 20 亿美元。越南侨民的汇款达到 90 亿美元，占越南国内生产总值的 8%。在 1986 年经济改革之前，跨越国界是一种具有高度选择性的特权，而目前在海外学习或工作可以提高国内劳动

力的素质，并改变越南作为一个民主和进步的共产主义国家在全球舞台上的政治形象。

一个双管齐下的方法

为了促进和控制这些人力资源的回归，政府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法。一方面，鼓励和支持个人出国学习或工作。另一方面，为减少那些不归的学生和工人，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例如：法令 81/2003 / ND-CP 和 144/2007 / ND-CP）引入对他们在越南的家人进行金融处罚，没收他们的储蓄；并且，如果他们回国晚了，则将对他们实施接下来五年不得出国的惩罚。越南教育和培训部要求成功获得国际和/或国内奖学金的学生在越南签订工作合同。完成学业后，需要在越南工作的时间是在海外学习时间的三倍，但根据当地劳动力需求可以协商。任何违反这些合同的行为都会被起诉并没收亲属的财产。

政府还呼吁越南侨民通过针对侨民的战略为越南的经济和知识作出贡献。2004 年第 40/2004/QH11 号决定为越南裔外国人申请临时或永久居留权提出了慷慨的计划。例如，他们可以在越南长期租房，设立公司分支机构，并获得减税和法律支持。这项决定还宣布在胡志明市和河内的两所国立大学建立高级研究中心，旨在吸引越南和国外的杰出研

究人员来教学和进行科学研究。

自 2009 年 7 月以来，如果所居住的国家允许拥有双重国籍，越南人就可以保留他们的越南国籍。他们享有作为越南公民的全部权利。自 2014 年以来，第 87/2014/ ND-CP 号法令允许各省雇佣拥有农业和技术专利、在国际上发表文章或拥有博士学位的高技能越南侨民。作为回报，这些人将获得经济利益、住宿和有前途的工作条件。

人力资本是一种多功能的社会资产

在越南，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商品被开发、使用和保留，以增加国家竞争优势。换句话说，这种商品不仅仅是个人拥有的——它是一种共享的社会商品。它是可衡量的，代表了政府参与全球人才竞争、将越南的政治形象转变为民主国家的努力。这种商品是由国家、与越南保持双边关系的国家的政府、国内外的大学以及学生和工人自己共同努力生产出来的，他们受到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指导。在国家看来，一个高技能的劳动力需要拥有外语能力、专业知识和国外关系，这对国家发展有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和使用是政治性的。人力资本，就其本身而言，不仅仅是个人财产，它是一种具有社会代表性的多功能资产。

衡量印度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潘卡吉·米塔尔、布珊·帕塔沃德汉

潘卡吉·米塔尔：印度新德里印度大学协会 (Association of Indian Universities) 秘书长

电子邮箱：pankajugc@gmail.com

布珊·帕塔沃德汉 (Bhushan Patwardhan)：印度新德里大学 (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

拨款委员会副主席

电子邮箱：bpatwardhan@gmail.com

毛入学率是高等教育入学率与 18-23 岁年龄组人口总数之间的比率。较高的毛入学率表示较高的参与度。根据 201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毛入学率在印度高等教育相对较低，为 27.4%，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29%)，这也大大低于高收入国家，如美国的毛入学率 (88.2%)、德国 (70.3%)、英国 (60%)。即使与巴西 (51.3%) 和中国 (49.1%) 等其他中低收入经济体相比，这一比例也很低。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讨论毛入学率是否适合印度这样的国家。

为什么印度的毛入学率低？

在印度，成功完成中学 12 年级学业的学生就有资格接受高等教育。印度高等教育中相对较低的毛入学率主要是由于缺乏合格的候选人。这种短缺主要是学校入学率低和辍学率高的结果。一些因素，包括性别、教学语言和社会经济限制等，是造成中学生人数逐渐减少的原因。合格候选人的短缺是阻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长的主要瓶颈。

显然，这不能通过增加学院或大学的数量，或通过远程或在线模式促进高等教育来解决。为了增加有资格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数量，印度需要专注于增加完成高级中学教育的年轻人数量。高等教育的可获得性、可

负担性和质量及其与就业的相关性也对全球教育战略有重要影响。许多 18~23 岁年龄组的人口总数与实际有资格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对于印度等中低收入国家来说，毛入学率可能不是衡量就业机会的最合适指标。

净入学率

为了更公平地比较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净入学率可能是一个更合适的指标。净入学率的定义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与 18~23 岁年龄组中成功完成高中学业的学生人数之间的比率。净入学率是一种明智的入学人数衡量方法，因为它考虑了资格参数，从而提高了指标的精度。

由于在大多数国家相关年龄段的高中毕业学生人数数据并不容易获得，我们在研究中使用与完成率 (Completion rate) 相关的数据来比较毛入学率和净入学率 (衡量高等教育的准入、质量和相关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定义，适龄人口是指在相关年龄组中完成某一特定教育水平最后一年级的人数，以该年龄组人口总数的百分比表示。净入学率可以用公式净入学率=毛入学率/完成率表示。我们使用这个公式来确定来自高、中、低收入经济体的 10 个代表性国

家的净入学率，包括巴西、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南非、英国和美国。

毛入学率与净入学率的比较

我们研究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五年来（2013-2017年）收集的数据。完成率的缺失数据是通过一个包含线性回归模型的预测工具计算出来的。将10个选定国家的净入学率与它们各自的毛入学率进行比较，我们发现，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净入学率的绝对差异远小于各自毛入学率值的差异。

有趣的是，我们也注意到，毛入学率与净入学率无论何时在高收入国家都是始终如一的，如美国（毛入学率88.2%，合格入学率93.5%）、法国（毛入学率65.6%，合格入学率75.5%）和英国（毛入学率60.0%，63.1%），这些国家的毛入学率和合格入学率的差别还不到10个百分点，是相对稳定和成熟的教育体系。我们的研究显示，印度（净入学率64.3%）比英国（净入学率63.1%）提供了更好的高等教育机会。印度尼西亚的毛入学率（36.4%）高于印度，然而其净入学率（57.7%）较低。巴基斯坦在毛入学率（9.4%）和净入学率（43.3%）方面排名最后。印度的毛入学率排名第八，但如果以净入学率作为指标，则排名第六。毛入学率和净入学率之间的巨大差异表明年龄组和符合条件的人口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2017年，印度毛入学率和净入学率的差异为37.5，是所有选定国家中最高的。这表明了学校系统的糟糕状况，高等教育的低普及率加剧了这种状况。对于印度这样的国家，净入学率提供了一种更现实的评估：在衡量高等教育参与度时，除了考虑年龄之外，还考虑教育资格，这样

会更精确。

高等教育质量可被视为任何国家的政策标志。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等高收入国家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参与知识经济，是因为它们的高质量教育注重技能获取和对就业能力的关注。这些国家也吸引了大量的国际学生，这有助于提高入学人数。此外，由于目前利用继续教育的趋势，加上技术和就业市场的迅速变化，23岁以上的工作人口在入学人数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因此，需要重新考虑毛入学率的定义，因为毛入学率与特定的年龄群有关。

结语

应平等地比较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在学校系统较不发达、国际学生数量极少的低收入国家，毛入学率并不是衡量学生参与度的合适指标。净入学率是一个更相关的指标，因为它考虑到了入门水平的不平衡。作为衡量高等教育参与水平的新指标，有必要对净入学率进行进一步的优化研究。

注：本文的数据来自《经济与政治周刊》（2020年）刊登的《高等教育准入、质量和相关性研究》一文。作者感谢他们的合作者安嘉利·拉得卡（Anjali Radkar）、安妮莎·库乐普（Anitha Kurup）和阿使瓦尼·卡罗拉（Ashwani Kharola）。